

逻辑哲学论

〔奥〕维特根斯坦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逻辑哲学论

〔奥〕维特根斯坦 著

韩林合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逻辑哲学论/(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
著;韩林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496-2

I. ①逻… II. ①维…②韩… III. ①逻辑哲学
IV. ①B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61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逻辑哲学论

[奥] 维特根斯坦 著

韩林合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496-2

2013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1/4

定价: 16.00 元



编译前言

《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其写作和出版均有一部曲折的历史。

《逻辑哲学论》是以若干本笔记(手稿)和打字稿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1912年初,维特根斯坦注册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本科生,后成为高级研究学生,随罗素学习逻辑和哲学。1913年9月初,维特根斯坦到挪威专心从事思考和写作。至9月底他写出了一部关于逻辑的手稿。在9月20日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类型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现在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必死于能够发表它们以前。这种感觉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因此,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可能早地向你传达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所有事情。不要以为我认为我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不能不有这样的感觉:它们能够帮助人们避免某些错误。或者我错了?如果是这样,请不要留意这封信。我当然无法判断我的思想在我死后是否值得保存下来。或许我

思考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可笑之举。但是，如果是这样，请原谅我的愚蠢的举动，因为它不是一种肤浅的愚蠢之举，而是我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愚蠢之举。我意识到，我越往下写越不敢说出我的目的了。但是，我的目的是这样的：我想请求你允许我尽可能早地与你会面，并且给我以足够的时间，以便向你概要地描述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的整个范围；如果可能，请让我当着你的面给你做些笔记。……我知道，向你提出这种要求可能既狂妄又愚蠢。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人——随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①

10月2日，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随即他便向罗素解释他的思想。但是，罗素发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是很容易理解，并且他也难以一下子记住他所说的东西。于是，他找了两个速记员帮忙。维特根斯坦先后以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口授了他的思想的摘要。同时，他还以英文向罗素口授了他在挪威所写的手稿中的一些内容，罗素做了记录。10月10日，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返回挪威继续其思考和写作。回到挪威后，他从已经写好的德文手稿中节选出了一部分寄给罗素。它们与他此前在剑桥向罗素口授的部分手稿合在一起组成了所谓“手稿一”、“手稿二”、“手稿三”和“手稿四”。在维特根斯坦走后，罗素找人将他的速记摘要打印出来，并于1913年冬至1914年春期间将维特根斯坦寄给他的全部手稿译成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ed. B. F. McGuinness and G. H. von Wright, Oxford: Blackwell, 1995, pp. 39 - 40.

英文。这个摘要和四份英文手稿合在一起被称为“逻辑笔记”(Notes on Logic)(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 TS 201a)。在此期间,罗素还重新排列了这些材料的顺序,并给每一个主要的部分都加上了标题(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 TS 201b)。1914年,罗素将经他整理的“逻辑笔记”送给了考斯泰罗(J. J. Costello),因而后来冯·赖特将其称为“考斯泰罗本”。前一种未经整理的形式被称为“罗素本”,现保存于加拿大麦克斯特(McMaster)大学罗素档案馆中。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考斯泰罗本“逻辑笔记”先是于1957年发表在《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第LIV卷上,后作为附录I于1961年发表于《1914-1916年笔记》(*Notebooks 1914-1916*)第一版中。在《1914-1916年笔记》1979年第二版中,罗素本取代了考斯泰罗本。

回到挪威后,维特根斯坦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逻辑思考和写作(或许还是在同一本笔记中)。1914年3月29日至4月14日,穆尔(G. E. Moore, 1873-1958)来访。维特根斯坦让穆尔看了他到此时为止所写的德文手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作为“逻辑笔记”和“向穆尔口授的笔记”的基础的这部德文手稿——或者说,这本笔记——已佚),并以英文向穆尔口授了其中的最新的成果。后来,穆尔的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口授笔记301号)以“在挪威口授给穆尔的笔记”(Notes dictated to G. E. Moore in Norway)的名称(穆尔给予它的名称是“维特根斯坦论逻辑,1914年4月”[Wittgenstein on Logic, April 1914])作为附录II于1961年发表于《1914-1916年笔记》第一版中。

穆尔离开以后,维特根斯坦继续其手稿的写作。但是,似乎成果甚微。在1914年5月或6月份写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我的工作在近4至5个月期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现在我又处于疲倦的状态,既不能工作也不能向你解释我的工作。……这样的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后我的工作才会有所进展。^①

在此期间,他在所住的旅馆附近的湖边山腰上建了一所小木屋。

1914年6月底7月初,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度假。但是,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6日,向俄国宣战。8月7日,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参加了奥匈军队。随即随(炮兵)部队开往处于奥俄边境的克拉科夫(Krakau)。8月9日,维特根斯坦便开始了其战时笔记的写作。开始两周的笔记只有私人部分(以密码的形式写出),哲学性部分始于8月22日。至是年10月30日,他写满了第一本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MS 101),并即刻开始了第二本战时笔记的写作。在12月份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如果我死于这次战争中,那么我会让人将我以前给穆尔看的那本手稿和我现在在这次战争中已经完成的一本手稿一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87.

并寄给你。如果我还活着,那么战后我会到英国向你口头解释我的工作——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①

从1914年12月9日开始,维特根斯坦被分配到所属部队总部的一所车间工作。在这里他享受到了相对安全和舒适的工作环境。至1915年6月22日,维特根斯坦完成了第二本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MS 102)的写作。在此后一段时间中,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哲学方面的工作具有总结性质。这点可以从他1915年10月22日写给罗素的信中看出: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而且我认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现在,在此我正在从【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进行摘录,并将所摘录出的东西以一本论著(*Abhandlung*)的形式写下来。在给你看这些东西之前,我绝不会出版它们。但是,这当然只有在战争结束后才有可能。不过,谁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活到那一天。假如我到那时已经死了,那么请让我的家人将我的所有手稿——包括最后的摘录(*die letzte Zusammenfassung*)(一系列散页,用铅笔写的)——寄给你。要理解所有这些东西你或许得做出一些努力,但是请不要因此而被吓倒。^②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91.

②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103.

这个用铅笔写的由散页构成的摘录稍后被整理进一本笔记之中。维特根斯坦的摘录基础是他到那时为止所写的所有笔记——包括两本战时笔记即 MS 101 和 MS 102, 在挪威给穆尔看过的那部手稿。这种总结工作于 1916 年 3 月下旬暂告一段落。这时, 他再度被派往前线。

1916 年 3 月底, 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作第三本战时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 MS 103)。不过, 4 月 15 日以前的笔记只含有私人部分。哲学部分的笔记是从 4 月 15 日开始的。9 月份, 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休假。在休假期间, 他着手从他所写的东西中整理打字稿(部分以向打字员口授的形式)。他可能打印出了两部打字稿。打字稿的基础是他到此时为止写的所有手稿(笔记)——挪威手稿, MSS 101、102、103(部分), (以散页和笔记本的形式出现的)摘录。

秋季休假结束后, 维特根斯坦于 9 月下旬到摩拉维亚(Moravia)的奥尔姆兹(Olmütz)军官学校接受训练。出发前他随身带有未完成的手稿 MS 103 和在维也纳整理出一份打字稿; 此外, 或许还带有其它手稿——比如在 1915 年 6 月至 1916 年 3 月中旬所做的那本摘录或论著。在受训期间, 维特根斯坦继续其 MS 103 的写作, 同时对所带的手稿和打字稿进行修改和补充(以附加手写稿纸的形式)。整个 12 月份他只写了一则笔记(2 日)。圣诞节前夕, 维特根斯坦的受训结束。在维也纳作短暂停留后于 1917 年 1 月 9 日返回前线。在此期间, 他继续写作 MS 103。不过, 所写的内容非常有限。MS 103 的私人部分在 1916 年 8 月 19 日就结束了。哲学部分结束于 1917 年 1 月 10 日。

MSS 101、102 和 103 的哲学部分于 1961 年以《1914 - 1916 年笔记》的名称出版。其中的私人部分因各种原因迟迟于 1991 年才得以出版,名称为《1914 - 1916 年私人笔记》(*Geheime Tagebücher 1914 - 1916*)。

接下来的叙述涉及冯·赖特编号体系中的 MS 104。1965 年 9 月,冯·赖特在维也纳发现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本重要的手稿,它是用铅笔写成的。所用笔记本的尺寸为 $20 \times 24 \frac{1}{2}$ 厘米,硬皮,用深绿色条格亚麻布装订。该手稿主要由两个部分和一个前言组成。第一个部分(第 3 页至第 103 页正数第 11 行以前),也是最长的部分,本身构成了一部独立的著作。冯·赖特认为它构成了《逻辑哲学论》的初稿,因而将其命名为“Prototractatus”(意即《〈逻辑哲学论〉初稿》)。第二个部分(第 103 页正数第 12 行以下至第 118 页)则是对 Prototractatus 所包含的内容的进一步的补充和解释。除极少数例外,出现于这部分中的诸评论与《逻辑哲学论》中的诸相应评论具有相同的数字编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表述形式也是相同的;所存在的差异不具有重要意义。

在该手稿的最后(第 119 页至第 121 页),有一个前言。它与《逻辑哲学论》的前言的区别是:没有给出日期和地点;在结尾处多出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

谢谢我的叔叔保尔·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和我的朋友伯特兰·罗素先生给予我的热情的鼓励。

由于该前言必是在第二部分完成之后写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专门为 Prototractatus 而写的。

Prototractatus 含有的 31 个完整的评论、2 个评论的一部分以及 6 个未加编号的段落未出现于《逻辑哲学论》之中。但是，另有一个未加编号的段落也出现于《逻辑哲学论》之中。在 Prototractatus 与《逻辑哲学论》的相应评论之间，大致有 400 处用词上的差异。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是不重要的。除用词上的差异外，还有思想的排列形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是很重要的。^①

MS 104 首页只有这样一段话：

将我的其它手稿中的所有好的命题加于这些命题之间。
数字表明了诸命题的顺序及其重要性。因此，5.04101 跟在 5.041 之后，5.0411 跟在 5.04101 之后，并且比它重要。

出现于第一句话中的“这些命题”一语所指的大概是手稿正文第 1 页（手稿页数为第 3 页）上的诸命题，它们构成了 Prototractatus 的“骨架”。

手稿的接下来的一页是标题页，所用标题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再接下来的两页分别为题献页和警句页。内容与《逻辑哲学论》相同。

^① 关于 Prototractatus 与《逻辑哲学论》之间的详细的对应与区别，请参见 *Prototractatus*, ed. B. F. McGuinness, I. Nyberg and G. H. von Wright, tr. 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H. von Wrigh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pp. 241 - 253.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Prototractatus 的外表结构和写作过程。从外表结构上看,Prototractatus 是由三个大单元构成的。第一个单元为第 3 页至第 71 页正数第 4 行以前;第二个单元为第 71 页正数第 5 行以下至第 78 页倒数第 4 行以前;第三个单元为第 78 页倒数第 3 行以下至第 103 页正数第 11 行以前。在这些单元之间各有一条横线将它们彼此分开。这样的横线似乎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写作过程的结束。由此,我们可以将 Prototractatus 的写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上面我们曾经提到,维特根斯坦在 1915 年 10 月 22 日曾经写信告诉罗素,他那时正在从他此前所写的所有手稿中进行摘录,并将它们写成一部论著的形式,而如果他在战争期间死了,那么罗素将会收到他的“最后的摘录”。这个论著或摘录先是用铅笔写在散页上,然后又整理进一本笔记中。实际上,这个笔记本极有可能就是记载 MS 104 的那个笔记本,而其所记载的内容——那部论著或最后的摘录——极有可能就是 MS 104 的雏形,即其第 3 页至第 70 页倒数第 3 行以前的内容。从内容上看,这种猜测也是非常合理的:MS 104 第 3 页至第 70 页倒数第 3 行以前只包含维特根斯坦 1915 年 6 月底以前所写的笔记(手稿)——作为 1913 年“逻辑笔记”和 1914 年“在挪威口授给穆尔的笔记”的基础的那本德文原稿,前两本战时笔记——中的内容。因此,Prototractatus 第一个单元的主体部分(第 3 页至第 70 页倒数第 3 行以前)应该写于 1915 年 6 月底至 1916 年 3 月下旬。

Prototractatus 第一个单元的另一部分(第 70 页倒数第 2 行以下至第 71 页正数第 4 行以前)共有 5 个评论。它们必写于 1917

年6月以前,因为在他姐姐海尔米·维特根斯坦(Hermine Wittgenstein)此时写给他的一封信上,维特根斯坦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Worüber man nicht red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对于不可谈论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这句话似乎是对出现于 Prototractatus 第71页第3和第4行上的评论7的一种修正: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这种修正意在强调如下两点:“Worüber”与“darüber”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呼应关系;和“sprechen”(言说)与“schweigen”(沉默)的对比相较而言,“reden”(谈论)与“schweigen”的对比效果显得更为强烈。(不过,在《逻辑哲学论》终稿中,维特根斯坦还是选择了原来的表述。)由于1916年3月下旬维特根斯坦再度被派往前线,而他在出发前将所有的手稿都寄回了维也纳,所以 Prototractatus 第70页倒数第2行以下至第71页正数第4行以前的5个评论的写作也应该是在1915年6月底至1916年3月下旬之间,但是它必稍后于第一个单元第3页至第70页倒数第3行以前的写作(可以说是对后者的进一步的补充)。麦吉尼斯(Brian McGuinness)将

Prototractatus 的第一个单元称作“proto-Prototractatus”(意即“《〈逻辑哲学论〉初稿〉之初稿”)。

Prototractatus 第二个单元(第 71 页正数第 5 行以下至第 78 页倒数第 4 行以前)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维特根斯坦 1916 年秋季休假期间。此间,他以他至此所写的所有笔记(包括 MS 103)为基础对 Prototractatus 的已有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事实上,这一部分包含着取自于 MS 103 中的大约 5 个评论;但是,MS 103 中 9 月 19 日以后的评论则无一出现于其中。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这个时间还让人给他打印出了两个打字稿。他在扩充 Prototractatus 的同时,或许也将所扩充的内容加进于这两个打字稿——至少是其一——之中(当然这种工作也可能是稍后在奥尔姆兹受训期间做的)。

1916 年 12 月底至 1917 年 1 月上旬,维特根斯坦在返回前线前在维也纳短暂停留。此间他给他姐姐海尔米·维特根斯坦开列了一张他当时已经完成的所有哲学著作的清单,其目的是如果他万一阵亡了,那么他姐姐应该将这张清单上所列的著作悉数寄给罗素,以便让后者帮助出版。他姐姐稍后(1917 年 1 月中下旬)又将这张清单抄写在另一张质量好一些的纸上。后者保留了下来,于八十年代末被重新发现。其内容如下:

- 1) 一本笔记(大小为公文用纸的标准尺寸,即 33×42 厘米)。保存在特伦克勒尔处。手写稿。
- 2) 2 本 4 开本笔记。保存在特伦克勒尔处。手写稿。同时还存在源自于 1.) 和 2.) 的打字稿。在奥尔姆兹有一本

修改过的打字稿。

- 3) 1本4开本笔记。只有手写稿。(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包含于打字稿中。)
- 4) 1本8开本笔记。只有手写稿。所有命题依次排列,未做任何修改。
- 5) 一本笔记(大小为公文用纸的标准尺寸,即 33×42 厘米)。包含对1.)和2.)的修改,准备出版。

将3.)、4.)和5.)以及1.)、2.)的打字稿和一块金制表寄给罗素。

将手稿1.)寄给平森特。

将特伦克勒尔处的那本打字稿毁掉。

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确定:1.)即他在挪威给穆尔看的那本手稿(由于该手稿中的一部分是与平森特一起在挪威度假时写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要将它送给他);2.)则是他当时已经全部完成的前两本战时笔记;3.)是他当时正在写作中的第3本战时笔记;5.)则是他在1915年6月底至1916年3月底所做的那本摘录或论著——更进一步来说,它就是MS 104(不过,这时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即 *Prototractatus*]的第一和第二单元)。的确,二者从外表上看似乎有所不同:MS 104 虽然比其它战时笔记本要大一些,但还不是标准的公文用纸的尺寸,因为它只有 $20 \times 24 \frac{1}{2}$ 厘米。但是,完全可以设想,维特根斯坦对其所用笔记本的大小的描述并不一定完全准确。这张清单中所提到的打字稿就是维特根斯坦在1916年

秋季休假时让人打出的那两份打字稿。由于在奥尔姆兹他对其中之一进行了修改，所以维特根斯坦告诉他姐姐，可以将保存在维也纳特伦克勒尔处的那本打字稿毁掉。出现于 3.) 中的括弧内的补充说明“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包含于打字稿中”似乎是事后加上去的。难于确定的是 4.)。它似乎是在 1916 年秋为打字员所特别准备的比较清楚的手写稿；或者是 5.) 的前身（未加修正的形式）。（但是，这种解释不无困难。因为如果这样，那么大概没有必要将其与 5.) 一并寄给罗素。）这张清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 1915 年 6 月底至 1916 年 3 月中旬之间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写出另外的战时笔记。

现在，我们接着确定 *Prototractatus* 第三单元（78 页倒数第 3 行以下至第 103 页正数第 11 行以前）的写作时间。这个时间段应该是 1916 年 9 月下旬至 1918 年上半年之间。在这个单元的写作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既使用了正在写作或已经完成的 MS 103 中的材料，也使用了以前所有手稿中的材料；此外，他还写出了许多新的评论（这些新的评论或者是直接写在 *Prototractatus* 中的，或者是从他 1917 年 1 月中旬以后所写的新的战时笔记——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笔记的话——中取出的）。因此，*Prototractatus* 大概最终完成于 1918 年上半年的某个时间。在写作这个单元的同时，维特根斯坦大概还对奥尔姆兹打字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特别是对其中的诸评论的序号或先后次序进行了重新安排。

1918 年上半年稍晚的时间至 7 或 8 月之间，维特根斯坦最终完成了 MS 104 的第二个部分的写作。我们看到，在这一部分中，在诸评论之间前后共夹有 8 条表示写作阶段的横线。这说明，这一部分也是在不同的时间完成的。

7月初至9月底,他在维也纳、萨尔茨堡(Salzburg)及其附近休假。在7月初至8月份这段时间,他以刚刚完成的MS 104和进一步修改了的奥尔姆兹打字稿^①为基础先后让人打印、复制出三本打字稿。稍早的一本后来被称为格木登(Gmunden)本,即TS 204;稍后以其为基础又打印或复制出了两本,分别被称为维也纳本(即TS 203)和恩格尔曼^②本(即TS 202,应该是复制稿)。格木登本含有大量的修改和用铅笔做的标记。恩格尔曼本含有更多的修改和补充。后来,维特根斯坦将恩格尔曼本称作“唯一改正了的本子”(das einzige korrigierte Exemplar)^③。维也纳本少了最后一页,只含有少量用铅笔做的修改,但没有实质性的补充。维也纳本与恩格尔曼本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的区别:其一,维也纳本没有评论6.1203,在恩格尔曼本中该评论是后加上去的(用铅笔,以附页的形式);其二,在恩格尔曼本中,评论6.241中所给出的是对命题“ $2 \times 2 = 4$ ”的证明,而在维也纳本中,则是对命题“ $2 + 2 = 4$ ”的证明(格木登本中原来也是对命题“ $2 \times 2 = 4$ ”的证明,但后来被手工改为对命题“ $2 + 2 = 4$ ”的证明)。

① 我估计这个被一再修改的打字稿就是MS 104第103页下部方括弧中所说的那本“校样”。“校样”德文为“Korrektur”。这个德语词严格说来是指印刷校样。但是,《逻辑哲学论》最早的印刷校样应该是奥斯特瓦尔德(W. Ostwald, 1853 - 1932)在1921年印行它时所做出的,而且维特根斯坦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个校样。因此,在这里“Korrektur”应该是指某个打字稿。

② Paul Engelmann, 维特根斯坦在1916年秋季休假时结识的重要朋友之一。后来维特根斯坦将打字稿副本之一送给了恩格尔曼。该本遂被称为恩格尔曼本。

③ 此语出于维特根斯坦1919年6月12日写给罗素的信(参见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116)。